

## 母亲

□程德凯



母亲不识什么字,却认得“藕粉”二字。那时候,镇上的小卖部,玻璃柜里摆着几袋东西,她踮起脚,隔着玻璃指一指,人家便拿给她。一袋藕粉,白底红字,她拿回家,小心翼翼地剪开一个小口,倒些许在碗里,先用凉水一调,再拿开水一冲,便成了半碗莹莹的半透明的东西。她端着碗,用筷子缓缓搅着,热气蒸着她的脸,脸是瘦瘦的,颧骨高高的,眼睛却亮亮地望着我:“快喝,喝了去上学。”那碗藕粉,稠稠的,滑滑的,带着一点甜味,我几口就喝完了,抬起头来,她还看着我,碗底剩下的一点,她兑了些开水,自己喝了。我后来才晓得,那一袋藕粉,她要卖多少针线才换得来。

说起针头线脑,母亲的小生意当真小得很。一个小木匣子,分了几格,针是针,线是线,还有顶针、纽扣、松紧带,杂七杂八的。逢赶集的日子,她早早地起床,背着木匣子走七八里路赶到镇上,在街角寻个地方,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,打开木匣子,那些小东西便整整齐齐地摆出来了。她坐在一个小马扎上,等着人来买。一根针,两分钱;一轴线,五分钱。有时人家拿来衣裳,要配个颜色的线,她便眯着眼睛,在光线底下比来比去,非要配得一模一样不可。这样的小生意,一天也挣不了几毛钱,她却做得很认真,仿佛那些针头线脑是什么了不起的物件。收摊的时候,她把钱一张张地捋平,硬币数好,用手绢包了,放在贴身的口袋里,拍一拍,才放心地回家。

我进城读高中那年,母亲做了一件让邻里议论的事。她请木

匠给我打了一口红木箱子,说是红木,其实是寻常木头刷了红漆罢了。但那漆刷得极亮,在太阳底下一照,红艳艳的,像一团火。箱子做好后,母亲把里里外外擦了一遍,又拿干布细细地揩过。她把箱子放在堂屋当中,揭开盖子,一股木香味儿便扑面而来。她站在箱子前,把自己做的两床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放进去,又把我的几件换洗衣裳叠好放进去,再把一瓶豆瓣酱、一罐咸菜、一包水果糖都放进去,看了看,又拿出来,重新摆过,直到摆得齐齐整整。那箱子沉得很,我一个人搬不动,是找过路的货车拉到城里,舅舅又一步步地背上三楼的。这些年,我搬了好多次家,这口箱子跟着我从城里到乡下,又从乡下到城里,漆也磕掉了,我却始终舍不得丢。有时候半夜醒来,月光照在箱子上,恍惚觉得母亲还在灯下收拾什么,像是不放心我一个人

在外头。

参军报到的头一天,我天不亮就醒了。母亲已起床,在灶屋

里忙活,灶火映着她的脸,忽明忽暗的。吃罢早饭,她送我到村口,站在那里,风吹着她的头发,她用手拢了拢,说:“你等等,我叫你三叔陪你走一段。”从我们家到公路,有五六里山路,窄得很,一边是山,一边是沟,有的地方连架子车都过不去。刚下过雨,路很滑,三叔走在前头,我走在后头,母亲也跟着送了一程又一程。“行了,妈,你回去吧。”“再送送,再送送。”她一直送到不能再送了,才站在路边,看着我们走远。我走了很远,回过头看,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,一个小小的影子,就像一棵种在路边的树。

那一年,我刚升职,母亲就病了。病来得急,她走得也快,前后不过十来天。她走的时候,什么话都没有留下,就安安静静地走了。我们清点母亲的遗物时,在一个旧手绢包里发现了一沓钱。有十块的,有五块的,有毛票,有硬币,一张张纸币叠得整整齐齐,每张票面上的折痕都清晰可见。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用红纸裹成

一根根小圆柱。三个人数了半夜才数清,共有三万二千元。那是母亲卖了多少针头线脑,省了多少个日日夜夜,才积攒下来的。她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重,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,舍不得用,却把这三万二千元留给了我们。

母亲在世的时候,常常对我说些朴素的话。她说:“人要多努力,力气用完了睡一觉就回来了。”她说:“跟人相处,要吃得亏才打得堆。”她说:“走正路,不要害人。”这些话,她说过无数遍,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那时候,我年轻,听不进去,只觉得她啰嗦。如今,她不说了,这些话却一句句地在我脑海里响起,像种子一样,在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之后,才慢慢地发芽、开花。

这些年,我走过一些地方,见过一些人,也吃过一些苦,受过一些累。每当我遇到难处,想起母亲,想起那一碗藕粉,那一口红木箱子,那一个站在路边不肯回家的影子,心里就生出些力气来。我常常想,母亲这辈子,到底给我们留了什么?是那三万二千块钱吗?是那口红木箱子吗?是一碗藕粉的甜吗?都是,又都不是。

窗外的雨还在下,我走到窗前,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,世界变得模糊,什么都看不清。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:“做人要像水一样,能流就流,不能流就渗,总要往前走的。”这句话她说了很多遍,我从来都没在意过。此刻,在异乡的雨夜里,这句话却清清楚楚地在我耳边响起,好像她就在我身边说着,声音不大,却一字一句地落在我的心上。母亲,你的话,我都记着了。

## 梦里团圆

□张皓

最后一次。

担架再次被抬起,这一次,是带母亲回家。

天阴沉沉的,飘着冷雨,绵密得像一张网。我紧跟在母亲后面,那一段路,走得无比艰难。回到家,把担架放平,我站在屋檐下,裤腿上沾着泥。雨仍在下,不知道是沿瓦槽流下的檐滴,还是横流在脸上的泪水,我分不清。

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,母亲终于回到了她操劳一生的屋子,每一样物件都在老地方,留着她的气息,默默地等着她。

把担架移进屋里,放在平时吃饭的方桌旁。昏暗的灯光被门框切割,斜落在母亲的脸上,光影缓缓移动,掠过那瘦削的轮廓和鬓角早生的白发。

我蹲在母亲身边,拉着她冰凉的手。空气里,混合着没散尽的柴火味,还有淡淡的、让人心慌的药味。那是家的味道——破

败、凄冷,却是我全部温暖的源头,可那个源头的温度,正在一点点地凉下去。

那一刻,灯光不再是照明,是一种昏沉的、无声的陪伴。陪着我们,陪着终于可以停下、却再也不会醒来的母亲……

母亲走了,这个世上,再也不会有人像母亲那样疼我了。

那是一个飘着冷雨的夜晚,雨不大,却足以淋湿我未来的人生。母亲穿着单衣,静静地躺在那里,一块青布,永远地隔开了我们。从此,每一个潮湿的天气,我都会想起母亲临走时,穿得那样单薄,像一片秋冬的落叶。这成了我后来每一个冬天里,最执拗的想象和最无力的痛楚:母亲在那条独自前往的、漫长无边的路上,她是怎样抵御那永恒的黑暗和彻骨的寒冷……

那一天,永远停留在时光里。收拾母亲的遗物时,我在她

那件破棉袄里,摸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五十块钱。她一生节俭,病得那么重,都舍不得为自己花钱。

三十八年了,每年冬天我都会做相同的梦,梦见母亲独自走在一条又黑又长的路上,风吹乱了她的头发,吹起那单薄的衣衫……

记忆里,母亲没穿过一件新衣服。

母亲,今天是您80岁生日。

我想为您置办一套冬装——一件白底红碎花的棉袄,絮上厚厚的棉花;一条深蓝色灯芯绒裤子,里面要衬着厚厚的绒;一双灰色的棉鞋,鞋边装上拉链,穿脱时不必费力弯腰……我还要亲手为您织一条柔软的围巾,松松软软,暖暖地绕过您的脖子……这样,您就再也不会冷了。

母亲,今夜我会为您亮着一盏灯,留着一扇窗,等风路过,等梦更深沉一些。等现实与梦境的边界变得模糊,等您踏着那熟悉的、细碎的步子,轻轻走来。就像从前的无数个夜晚,您轻轻推开房门,抖落一身岁月的风霜。

三十八年了,今夜,我们在梦里,好好团圆。

这几天天气特别好,久违的阳光照进窗台,这暖意让人有些恍惚。总有一些太阳照不进的寒意,凝在时间的断层里。

那是1988年的冬天,我生命里最寒冷的记忆。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女孩,紧紧攥着母亲的手,久久不肯松开……

母亲的大半生,被田埂和灶台定义。她天不亮就起来,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。她蹲在灶前,一把把地往里面添柴,米粒在锅里翻滚。她忙着做饭、剁猪草、喂猪,收拾屋子。匆匆吃过饭,扛起农具下地干活。从灶台到田埂,从田埂到菜地,再从菜地回到灶台。那条路,她走了无数遍。

母亲从早忙到晚。夜里,一家人都睡觉了,她坐在灯下,用那双粗糙的手,拈起针线缝补衣衫。

四十二年的重量,最后压缩成生命里最后的两天。

“送来得太晚了。”医生的诊断就像一块坠落的石头,砸碎了我的整个世界。

四十二岁的母亲,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,眼皮无力地耷拉着。这是她第一次去医院,也是